

海外视野

今天的大学生趋之若鹜地选择赚钱行业,这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之一,但作为青年才俊、未来社会的栋梁,他们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该如何体现,又在哪里可以体现? 为此,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——

大学毕业生该向何处去

■郭英剑

哈佛教授的忧虑

4月10日,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穆来纳森的文章《当学生选择了金融行业的工作,为什么哈佛教授的心情五味杂陈》,这位哈佛教授何以口出此言呢?

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。在哈佛毕业生的选择中,连续三年排在第一位的是进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人,这一比例2012年为17%,2013年和2014年均为16%。连续三年位居第二位的是金融行业,2012年为11%,与咨询行业并列第二;2013年为12%;2014年为13%,与传媒等行业并列第二。我们可以看出,这一选择的行业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。

就2014年而言,并列第二位的是传媒、体育、营销、零售业与艺术等,占毕业生人数的13%。其余职业所占比例如下:技术或工程为9%,咨询领域为8%,政府、军事及NGO等为8%,教育为7%,医学与公共卫生为7%,无明确职业规划者占6%,科学或者环境领域占5%,志愿者或者旅游业为3%,法律行业为2%,企业、专栏作家或者自主创业为2%。

在上述数据中,实际上是五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了进入金融行业。为此,穆来纳森不无感慨地指出,我们的优秀学子都不选择进入研究所、教学单位和去影响下一代人,也不去谋求在公众服务领域中供职,相反,很多人愿意成为商人、经纪人与银行家。于是,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:这是否是我们优秀人才的最好出路?

个人回报与社会回报

当然,对于毕业生来说,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是个人自由,都是为了去实现个人的梦想,每位教师自然也会向学生表示衷心的祝贺。但在祝贺之余,穆来纳森不禁问道:这样一个决定,对一个社会来说,是否有益呢?

为此,这位经济学教授从经济学原理上作出了独特的解读。穆来纳森说,每项职业都分个人回报与社会回报两种。前者指的是个人享受的劳动成果,而后者则指的是社会享受的劳动成果。他举例说,如果在网上开办了一家主营照片的网店,那么,个人回报就是所得到的收益,而社会回报就是顾客购买到照片后的那份喜悦。

记者快评

最近一周,不管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振中本人愿不愿意,他在媒体中又“火”了一把。

这件事起因很简单:今年元旦后,南振中向全院学生发起与读书有关的调查。在调查前,不少学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。而针对这些困惑,南振中利用寒假时间给学生写了74封回信。这件事本周被媒体报道了出来,并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。

必须承认,南院长的所作所为让人心暖,公众的称赞也发自内心的。但在我们竖起大拇指的同时,是否内心也会泛起一丝疑惑——这件事真的很“不寻常”吗?

古语云: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当一名老师发现自己的学生产生困惑时,无论这份困惑是关于什么的,都有义务给予解答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南振中的所作所为,只不过是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师者的义务,而至于那74封信,也只不过是履行自己义务的方式而已。这样看来,南院长的行为其实并不值得大书特书。

然而现实却是,人们还是被南振中的行为感动了。这份感动背后,究竟折射出什么呢?

如果稍加回忆,就在一年多以前,还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——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信箱对学生来信的“卖萌”回复曾一夜间走红网络,赢得“点赞”无数。这件事与南振中的回信有着本质的相同点,那就是高校的行政领导层主动放下姿态,与学生进行平等、无间隔的交流。然而,正如前文所言,在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校,这样的行为本身并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,它本应就是高校管理层与学生之间的正常状态。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,正常状态变得并不“正常”了。

“卖萌”回复的一夜走红,反衬的是高校领导在学生管理中普遍缺乏与学生沟通的状态;南振中的74封回信,反映出了众多“领导”疏于对学生日常学习、生活的指导与关心。而这样的“异态”在高校中大量存在,以至于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。于是,当有人回归到“常态”时,人们反而不习惯了,反而关注了,反而“感动”了。

在此,笔者对南院长的行为并没有丝毫的异见。相反,在一片“异态”中,南院长那一封封或长或短的回信反而让人感到温暖。只是,如果有一天,当我们周围温度都在上升,当南院长那饱含深情的回信在一片温暖中不再显得那样突出,我们的高校是不是会让人更加留恋呢?



图片来源:www.quanjing.com

但是,有些职业的从业者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回报。发明家就是最佳的案例。比如现代半导体就引领了无数的发明——今天我们所有与计算有关的产品都与它有关。

然而,不能不说的是,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巴尔多恩、布拉泰恩与肖克利这三位半导体发明者,尽管他们的发明催生了那么多的发明创造,却没有从自己的发明中获益。因为专利很少涵盖发明中所借鉴的其他知识,而且知识是公益且自成体系的。正如半导体催生了其他发明,巴尔多恩等人也是依赖于众多前人的洞察力与发明创造,才发明了半导体。需要强调的是,不仅是发明家,教师与非营利工人也同样提供了比个人价值更多的社会价值。

穆来纳森说,自己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其实是来自亚当·斯密。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,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中,我们既可以做自己的事情,同时也能够为大多数的人作份贡献。就此而言,发明家作出了更大的贡献,而我们大多数的人也同样可以去体现我们的价值。换句话说,只

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就会对社会有益。

人们该怎样选择美好的生活

当然,并非所有人都以上述方式来作出自己的贡献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、经济学家墨菲与维特尼,以及哈佛大学教授石雷佛都认为,当一个国家的人才都变成了我们经济学家所称的“寻租者”时,这个国家将会遭受苦难。所谓“寻租者”,他们不是创造财富,而仅仅是从别人那里将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。

一般来说,人们从工作岗位的名称上是很难确定哪些人是寻租者的。比如,同为律师,有人通过帮助他人起草简明扼要的合同,推动了贸易前进的车轮,从而获得财富;而有些辩护律师则利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,通过追逐无聊琐碎的诉讼案而榨取佣金。但在穆来纳森看来,这种寻租的行为遍布于金融的各行业。比如,银行业会通过收取一些隐秘的费用赚钱,而非通过增加真实的价值而赢利。

域外传真

“母亲也可以搞研究”

我的女儿放在托儿所后,我树立了一个新目标——根除我的任何拖延倾向。但是,不久后我就发现,导师并没有看到我的决心和学术热情。

相比从前作为一个单身无子女的研究生时,我现在的的时间管理和生产力都有所提高。导师在为我的博士后申请所写的推荐信中,提到了我有一个孩子——这关系到我的工作质量;在解释这一点前,他提到对我的研究“有点担心”,不过最后,他终于放心,我没有因为生产忽略我的研究。

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丽·安·梅森发现,如果女人成为母亲,她申请成为一名助理教授是不太可能成功的。她写道:“如果女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当学生或者研究人员时生孩子,她们离开学术界的几率是新爸爸们或者无小孩女性的两倍。”为什么?美国《高等教育纪事报》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梅森的研究,男人们被视为“理想的工作者”,他们能够把所有的时间、精力都用于研究。

这种说法对于研究生和博士后来说受害最深,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工作了。我们担心找不到更多的资金,担心无法发表新文章,担心下一个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。此外,我们还要设法努力让一个小家庭

维持稳定。所有这一切,都已经不利于做学术的父母了——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压力和审查。

然而,对于那些象牙塔顶端的女教授来说,严格审查依然存在。有孩子的女教授被称为女超人,许多评论都纳闷或者惊叹她们是如何“做到”或“拥有一切”的。她们在母亲与学术生涯二者之间做到平衡,对这件事表示惊讶本身就在表明,这两者通常被视作“不可相容”。

能够在固定时间(如上课)之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,是母亲们寻求平衡照顾孩子与学术生涯的有利条件。我能在下午和孩子相处,是因为我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加倍工作。更重要的是,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进展的时候往往是不积极工作的时候。比如帮助我的女儿做拼图时,或者把石头扔进湖中的时候,许多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里盘旋,当我再次坐下来书写时,反而更有工作效率。

大学与其研究身为母亲的女性的工作能力,不如换一种思维,即认识到多样和灵活的工作模式可以产生伟大的研究。大学需要开始重视作为学术生产者的母亲,重视她们的工作成果,必须包容和接受我们的双重角色——母亲和研究人员。

(本报记者韩琨编译)

用“动商”诠释校园足球

■王宗平

人们对体育片面的认识和偏见。

校园足球与体育有着类似的经历。校园足球,本应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。然而,在很多校长、老师、家长的眼里,踢足球的都是调皮捣蛋、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,千方百计阻止学生踢球。校园里没有了足球,足球人口没有了依托,竞技足球就没有了根基。校园足球要发展,首先必须改变人们对足球的偏见,而改变这种偏见,动商却是一个契机。一个通俗的说法:评价一个学生体育不好,家长不会太介意,但如果评价学生动商不高,家长必定和你着急。动商这个全新的理念,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接受体育本来应有的内涵,也还原了校园足球真实的含义。

动商的提出和重振校园足球,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,那就是让体育回归教育,让校园足球发挥教育功能。如今,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个悖论:一方面人们对体育充满了偏见,另一方面青少年体质却连续下降;增强体质必须靠体育锻炼,对体育偏见却阻碍着体育锻炼。动商,就是要打破这种怪圈。人们总是担心孩子在踢足球中容易受伤。不可否认,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有一定的危险,但这种危险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体

随着学业的结束,同学们将进入社会,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首先需要你们去适应,去努力,去奋斗。但无论你们做什么,无论何时何地,总有一些原则需要去铭记、去坚持,这些原则支撑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,化作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今天,在你们即将离开的时候,我想对你们讲三句话。

沉下心来,踏实做事

第一句话:“沉下心来,踏实做事。”同学们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,对新的工作你们一定会有很多想象。那是一份崭新的工作,或令你期待,或令你失望,但我要讲的是,不论这份工作如何,希望你们都能沉下心去做、踏实去做、用心去做,千万不能好高骛远、眼高手低,须知做完一件事容易,做好一件事却并不容易。

当下社会环境多有浮躁和功利,只有用心把小事做好,把平凡的事做好,才能奠定好成功的基础。任何成功和伟大都是积累和磨炼出来的。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、被称为我国“氢弹之父”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,从拿着计算尺从事复杂的计算开始,几十年如一日从事高度机密的科学研究工作,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,甚至连他的名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人知,但这并不影响他作出让国人自豪、让世界震惊的成果。

同学们在在工作中要善于学习,善于与人合作,培养团队精神,不要斤斤计较。不要怕吃苦,不要怕吃亏,不要小聪明,要有大智慧。在工作中要善于积累正能量,对那些不如意的人和事,要有平常心,要理性对待,不要抱怨,因为怨天尤人,丝毫无济于事。同样的条件,为什么有人成功,有人却一事无成?你们要做有心人,要践行交大的“知行”校训,勤于思、敏于行。

时刻不忘责任

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句话是:“时刻不忘责任。”同学们,结束研究生学习,标志着大家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;走上社会,你们要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。有责任感,你就会更有动力,就能自律,就能担当。

说到责任,第一是对自己负责,要有抱负、有激情,做好人生规划,要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,并为之努力奋斗。你可以失败,但不能自甘平庸。第二是对家庭负责,对父母妻儿担当起自己的责任,不能推脱逃避。父母为你们付出了那么多,不能让他们失望,更不能让他们担心。你们也将哺育下一代,你们一定希望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和学习条件。第三是对社会、对国家的责任,要做好自己的事业,为社会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当今世界,国际形势变幻莫测,人类文明进程共同面对着诸多挑战,如气候变暖、化石能源枯竭、恐怖主义等。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,创新驱动战略正在实施,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进,信息化、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同步进行,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从来没有这么近过。作为研究生,你们有责任、有义务为人类文明进步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、为“中国梦”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。面对当今世界、面对国家的发展,如果你无所作为,那是一种失职的耻辱,应该受到良知的谴责。

坚守

最后,我想同大家谈谈“坚守”,这里有两层含义。一是对自己选准的方向,对自己承担的责任的坚守。前面我提到的于敏院士正是这样的典范。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,没有多年的积累,终将一事无成。不要期望一举成名、一夜暴富,那都是不靠谱的神话。我们要相信科学,“厚积薄发”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。

第二是告诉大家要坚守底线。江河之水滚滚向前,但它再怎么汹涌,也不能越过两边的河岸——对它来说,河岸就是它流动的底线。坚守底线,可为人类造福,逾越底线,则将千里汪洋,民不聊生。

自然万物如此,人亦如此。每个人都要在心中为自己画上一条底线,当我们向着目标奋进时,这条底线就将时刻约束着我们。在未来的生活中,当你们面临诱惑和危机时,当你们对成功无比渴望时,都必须意志坚定,坚守住“道德与法律”的底线,逾越了这个底线,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,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生活中这样的警示太多了。当前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希望同学们能做知法守法、遵守道德的典范,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。

(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,本文为作者在该校2015年春季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。本报记者陈彬整理)



宁滨

成长路上的『三原则』